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声调变异及其社会因素的调查研究 ——以霹雳州北部三个相邻渔村的普宁话为个案分析^{*}

邱克威

(马来亚大学, 中文系)

摘要: 马来西亚的各种汉语方言经过百余年的彼此接触变异中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方言变体”, 在海外汉语方言的研究中具有特殊价值与意义。首先是马来西亚华人的方言生态保留较多早期南来移民的原始面貌, 尤其在乡镇地区, 方言的使用度也较高; 然而由于长时间不同方言间的接触, 尤其加上各种特殊社会因素的变化, 因此同一个乡镇方言南来之后也会形成彼此各异的变异形态。本文通过马来半岛北部霹雳州与檳城州交界的三个原籍潮州普宁人聚落的调查研究, 并结合当地社会因素的比较, 探讨与分析当地普宁话声调特殊变异与其社会形态的相互影响。由此观察得知, 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除了保留着原籍乡镇次方言的音系特征以外, 还随着各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形态。

关键词: 海外方言; 马来西亚汉语方言; 潮州方言; 普宁方言; 方言声调变异

一、绪论

马来西亚的潮州方言族群是国内华人人口中较大的一支, 全国各地分布着几个较大的潮州方言籍聚居的城市, 比如马来半岛南端柔佛州(Johor State)的新山(Johor Bahru)以及半岛北部檳城州(Penang State)的大山脚(Bukit Mertajam), 其中新山甚至有“小潮汕”之称。此外, 马来半岛西海岸面向马六甲海峡的沿岸, 由南至北遍布着许多潮州方言籍的百年渔村; 按其大致的分布, 南部至中部主要为原籍澄海市, 而北部的渔村则主要由原籍普宁人形成。

本文调查的霹雳州(Perak State)与檳城州交界的三个相邻渔村, 分别为霹雳州的瓜拉古楼(Kuala Kurau)与丹絨檳榔(Tanjung Piandang)和檳城州的高渊港口(Sungai Udang)。这三个渔村都聚集大量的潮州方言籍居民, 而且都主要源自广东普宁市的北山村。其中丹絨檳榔与高渊港口甚至逾 90%人口为普宁籍, 后者更是近 70%源自普宁北山村, 且绝大多数姓许。

如此高度集中的原籍普宁的华人聚居, 而且还主要同源自北山村; 这三个渔村至今普宁话还仍是当地社区的最通行语言, 因此当地普宁话大体保留着原籍的音系特征。然而, 潮州方言籍先民南来定居于这三个渔村都在百年以上, 加上各自由于社会环境不同, 比如瓜拉古楼的华人人口中原籍普宁与原籍福建同安的各近半数,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其各自的普宁话音系必然会因语言接触等各种社会因素而产生变异。

当然, 语言作为社会现象, 词汇是最先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产生变异的。因此陈晓锦(2013)提出, “词汇研究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重中之重”。只是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 经过南来闽粤客三大方言群的先民上百年的相互接触交流, 彼此影响下产生的变异形态已不仅限于词汇的借用, 而往往是已深入到语音系统内部。这是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变异现象的特殊性, 也是其调查研究的特殊价值与意义。

根据目前调查方言之间接触下的音系变异中, 声调系统的变异是比较突出的。比如杨迎楹(2014)记录过檳城州福建话的上声调受其他方言影响而产生了变异; 另如郑秋盈(2016)也记录瓜拉古楼的普宁话阴平调受福建同安话影响发生了变异; 又如邱克威(2016)调查雪兰莪州(Selangor State)丹絨士拔(Tanjung Sepat)的澄海话阴入调的连读变调主要受当地福建诏安话的影响产生了变异。此外, 陈晓锦(2006)调查泰国曼谷半山客话, 也曾记录其上声字受当地潮州话影响产生变异的例子。

^{*} 邱克威(Khoo Kiak Uei), 马来西亚, 男, 博士,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高级讲师, 汉语音韵学, drkhoo@um.edu.my。

本文调查分析的三个相邻渔村，其中的普宁话声调系统与原籍普宁话比较，都产生了一些各自特殊的变异。而这些特殊变异的产生机制与产生原因，都可以根据当地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不同方言群的接触影响中获得解释。

以下本文先由这三个渔村的社会概况入手，重点分析其中不同方言群聚居交流的历史发展。然后再比较这三个渔村普宁话的声调系统，尤其与原籍普宁话的比较中分析各自的差异，并结合其社会环境因素探讨这些差异所产生的原因。

二、三个渔村的社会概况

本文主要于 2016 年 4 月间以及 8 月间对这三个渔村普宁话的语音系统进行调查记录，尤其重点调查高渊港口^[1]与丹绒槟榔^[2]；至于瓜拉古楼则参照郑秋盈（2016）的调查结果，并且进行验证调查以及二字连读变调的补充调查。此外，作为社会环境调查，本文还曾于 2015 年 12 月间走访瓜拉古楼与丹绒槟榔两地，进行社会历史资料采集。

潮州人在这三个渔村的开埠都在百年以上。其中高渊港口与丹绒槟榔的普宁籍居民都以捕鱼为生，而瓜拉古楼的普宁籍则多数开店铺经营杂货生意，村内的渔户主要是福建同安籍。这种职业的方言群划分自开埠时就已如此，至今延续了百余年。三个渔村目前仍是以方言为主要社区用语，高渊港口与丹绒槟榔都是通行普宁话，而瓜拉古楼由于村内同安籍与普宁籍人数各占一半，而且大体分区明显，因此各自方言群内部就以本方言为通用语。

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三个渔村沿着马来半岛西海岸连成一条南北线；由霹雳州北部的瓜拉古楼开始，一条小路直线北上到达丹绒槟榔，过了丹绒槟榔再直上越过霹雳州与檳城州的交界就到达高渊港口。这一地区基本都是马来村庄，因此从瓜拉古楼至高渊港口的一路上，这三个渔村就是本区域最大的华人聚居地了。所以说这三个渔村大体是由马来村庄所包围。当然，附近较内陆地区还是有几个更大的华人较多的城镇，比如檳城州的高渊（Nibong Tebal）、巴里文打（Parit Bunta）、爪夷（Jawi）等。

下面我们逐一介绍这三个渔村的社会概况。

（一）瓜拉古楼（Kuala Kurau）

瓜拉古楼位于马来半岛霹雳州的北端。根据郑秋盈（2014）调查，瓜拉古楼分为“对面港”与“古楼”两个区域，二者由一条海水通道相互隔开。对面港是个渔户聚居地，基本都是福建同安籍居民。古楼则分为大街、半港和港脚三段，潮州方言籍基本聚居于大街到半港这一段，而港脚则多属于福建同安籍。瓜拉古楼的潮州方言籍居民主要都是源自普宁市的北山村。

对面港和港脚两地的同安籍多是渔户，而大街到半港的潮州方言籍居民则主要是开店铺做买卖的。由于两个方言群基本分区居住，因此各自都以自己方言作为社区内通行语；而根据当地居民口述，由于对面港同安籍属于当地的最早居民，因此同安话更为根深蒂固，所以若双方进行对话，则更多以同安话为共同交际语。

瓜拉古楼至高渊港口一带的渔港，由于位处马六甲海峡且又与檳榔屿（Pulau Pinang）隔一条海道相望，占尽东西贸易上的地利之便。而瓜拉古楼因为渔产尤其丰富，更重要的是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一位同安籍巨商王仙水，他所创立的“连盛栈”掌控了檳榔屿与半岛内陆、以及半岛沿着马六甲海峡的南北贸易运输，使得瓜拉古楼成为整个区域的贸易交通重镇。对此，王秀南（1982）如是描述：

当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瓜拉古楼已是经纬万邦，万家烟火之市镇矣。沿马来西亚西海岸威斯利省高渊（Nibong Tebal）而下瓜拉牛拉（Kuala Gula），而下太平卜卫港，马六甲海峡风墙浪舶，汽船风驰电逝，上下往还，利涉大川，此霹雳州西海岸府海之浩博资源也。

此外，1927 年《叻报》上的“南洋群岛商埠考”（陈穆群 1927），记录各地重要通商市镇，就有“瓜拉古楼”之名，其云：

地滨麻六甲海峡，交通水有古楼河，陆有长途汽车路与本邦各大商埠通，……

可见其近百年前就已属于“南洋群岛”上的重要商埠。

当然，1960 年代以后，瓜拉古楼的光辉不再，失去了交通地理的优势，而且海产也大不如前。目前村内渔船仍有一千余艘，但据当地渔户口述，却仅是当初数量的不足三分之一^[3]；而其现今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已落后于邻近的丹绒檳榔。

（二）丹绒檳榔（Tanjung Piandang）

丹绒檳榔，当地居民习惯称其俗名曰“角头”。根据张姿敏（2015）的调查，“角头”之名源自丹绒檳榔开埠初期所建的一座百年古庙位置正处于当地交通要道上的一个转角，故周边居民都称此处为“角头”。

丹绒檳榔位于瓜拉古楼的北面，是一个普宁籍为主的渔村，属于其他方言群的居民比较少。因此当地社区的通用语就是普宁话。据许武荣（1951：63）称：

除少数他帮外，九十余巴仙为潮人，潮语最通行，广、福、客的侨胞，他们亦要装着生硬的腔调说潮州话。

丹绒檳榔的普宁籍居民主要都是从事捕鱼业。

与瓜拉古楼一样，丹绒檳榔的普宁籍居民也主要是源自北山村。一直以来，丹绒檳榔与瓜拉古楼这两个渔村彼此相邻，居民中也占有大量普宁籍，且又多属北山村，所以两地居民彼此都颇有往来。只是从社会经济等发展来看，一直到近期为止瓜拉古楼都是远远发达于丹绒檳榔的。比如逾半个世纪前的许武荣在记述中就曾着意做过两地社会建设方面的比照，其云（1951：62-65）：

角头的公路，可说是北马最坏的一条，崎岖不堪，如遇大雨，道路泥泞，泥水一跳数丈高，……整个市镇，仅有五间屋顶用瓦盖的木屋，其余皆亚答屋，街道亦仅有一条，依河而建筑，其市容之不整，街道之不洁，由此可见一斑。……教育方面，文化低落，谈不到水准，……

古楼街道与角头相比有天渊之别，街道颇整洁，风景幽美，……市场总数百余户，经营各种粮食什货、茶楼、咖啡室，……交通上极便利，海路大小汽船可通往各商埠，陆路有“巴士”车川行毗叻属巴里文打及麻东色海而至太平。教育亦比角头较为发达，……

由此可见，虽然角头目前的经济发展略胜于瓜拉古楼，但历史上瓜拉古楼的开发与建设则是远甚于角头的。

（三）高渊港口（Sungai Udang）

高渊港口位于檳城州的最南端，与霹靂州交界处的丹绒檳榔就仅仅一步之遥。那一带的居民口头上都根据潮州方言称高渊港口为“港嘴”。

高渊港口居民成分更为单一，逾 90%人口为潮州普宁籍，又近 70%源自普宁市的北山村；而且北山村籍的居民几乎都姓许。高渊港口的社区通行语就是普宁话，甚至于村内极少数的其他方言族群也都放弃本方言而通用普宁话。

高渊港口的地理形势较特殊：面向村口的一条车道笔直连接着丹绒檳榔，而进入村口后不到一公里的大街马路就直线通往港口码头，即整个村子基本就是这么一条笔直的车道。因此这是一个囊状的渔村，整个渔村陆路就仅有唯一一条进出口道路。高渊港口规模很小，目前也仅三四百户人家，总人口约四千左右。

根据 1958 年的官方档案记录，当时高渊港口的人口也仅 460 人，户籍不足一百。（RIDA 1958）可见其一直以来都是个小规模渔村。

由于居民成分相对单一，村子规模又小，高渊港口的行业性质也很单一，即几乎都是捕鱼为业。村子内至今仍是极少经营餐饮杂货业的。然而比较奇特的是村内老一辈居民很多都会说一些“福建话”，至少都能听得懂“福建话”^[4]。根据当地居民口述，原来数十年前村外的马来村庄双溪亚齐（Sungai Acheh）住着数十户原籍福建同安的居民，他们主要经营杂货铺

或小型餐饮店，以及摩托车维修作坊。由于四周全是马来村庄，这些店铺的主顾主要是高渊港口居民，因此他们与高渊港口居民之间的往来非常频密。只是 1960 年代末期，由于连续发生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冲突，几乎当地所有的同安籍居民都已迁移；而目前则仅剩二三户人家。^[5] 也正因如此，目前高渊港口的年轻一代居民会说或听懂“福建话”的并不多。

三、声调变异的比较分析

广东普宁市北山村的方言属于普宁次方言中的流沙腔，是普宁话诸口腔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我们以马来亚半岛西海岸霹雳州与檳城州交界的三个渔村——瓜拉古楼、丹絨檳榔、高渊港口——的普宁话的声调系统，与原籍普宁市的普宁话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的异同。

首先，我们将各地单字调调值与二字连读的前字调调值，列表比较如下：（广东普宁声调调值，根据《普宁方言志》）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瓜拉古楼	33	55	53	13/21	212	21	2	5
丹絨檳榔	35	55	53	13	212	21	2	5
高渊港口	35	55	53	13/21	212	21	2	5
广东普宁	35	55	53	13	212	21	2	5

表 1：单字调异同表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瓜拉古楼	33	21	21	33	55	33	5	2
丹絨檳榔	33	21	21	33	55	33	5	2
高渊港口	33	21	21	33	55	33	5	2
广东普宁	33	21	13	33	55	33	5	2

表 2：二字连读前字变调异同表

从上表我们能看出，相较于原籍普宁话，马来西亚这三个渔村的普宁话都产生了变异。而且由于各地社会语言环境都各有特点，因此其变异形态也都各有异同。以下我们进行列表举例并分析说明：

（一）瓜拉古楼阴平调调值由原籍的 35 变为 33；其余保持不变，与原籍同样为 35：

	瓜拉古楼	丹絨檳榔	高渊港口
诗	si33	si35	si35
梯	t'ui33	t'ui35	t'ui35
灯	teŋ33	teŋ35	teŋ35
方	hiŋ33	hiŋ35	hiŋ35
安	aŋ33	aŋ35	aŋ35
天	t'ɿ33 / t'iaŋ33	t'ɿ35 / t'iaŋ35	t'ɿ35 / t'iaŋ35
初	ts'iu33 / ts'ɔ33	ts'iu35 / ts'ɔ35	ts'iu35 / ts'ɔ35
猪	tu33	tu35	tu35
尊	tsuŋ33	tsuŋ35	tsuŋ35
开	k'ai33 / k'ui33	k'ai35 / k'ui35	k'ai35 / k'ui35

表 3：阴平调变异举例比较表

瓜拉古楼的阴平调完全由原籍的 35 变为 33。我们上一节介绍瓜拉古楼说起人口有半数福建同安籍，而且同安话在当地很通行。根据《同安县志》“方言卷”所记福建同安话的阴平

调调值为 44，而林湘恬（2016）调查瓜拉古楼同安话的声调系统也同样记录阴平调为 44。由此可见，瓜拉古楼普宁话阴平调的调值变异跟当地同安话是有关的。实则，郑秋盈（2016）如是解释：

这变异是受到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影响下才形成的特殊变体。就内部因素而言，普宁话阴平调本身的连读变调就是中平调33。在这基础上，本地福建同安话和潮州潮阳话作为外部的因素，对本地普宁话阴平调单字调调值的影响甚大。

因此这一声调变异在瓜拉古楼之所以如此彻底，主要是因为自身连读变调与同安话声调调值的双重影响。

此外，丹絨檳榔与高渊港口二者村内的居民都基本为潮州普宁籍，因此其阴平调调值仍保留为 35。

（二）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阳上调值部分变为 21；丹絨檳榔则保持原籍 13：

	瓜拉古楼	丹絨檳榔	高渊港口
氏	si21	si13	si21
户	hu21	hu13	hu21
在	tsai21	tsai13	tsai21
后	au21	au13	au21
部	pɔu21	pɔu13	pɔu21
罪	tsue21	tsue13	tsue21
受	siu21	siu13	siu21
伴	p' ũa21	p' ũa13	p' ũa21
淡	tam21	tam13	tam21
仗	tsiaŋ21	tsiaŋ13	tsiaŋ21

表 4：阳上调变异举例比较表

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普宁话的阳上调调值的部分字由原籍的 13 变异为 21，而丹絨檳榔则保持不变。首先，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的阳上调调值变异为 21，实际上也是同安话的影响。瓜拉古楼村内本来就通行同安话，变异的原因自然与其阴平调相同。因此郑秋盈（2015：61）也推测说：

在本地普宁话的阳上调中，还有一部分全浊声母上声字读为阳去调。……我们推测，本地普宁话阳上读21调可能与本地福建方言息息相关。

至于高渊港口，则上一节介绍其社会概况，提及村外早期聚居着数十户福建同安籍，且与高渊港口村民往来频密；这就是造成其阳上调部分字变异的原因。

根据《同安县志》与林湘恬（2016）调查的瓜拉古楼同安话，其上声单字调同为 31；而且其中阳上字全都归入阳去。因此，按照本文调查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普宁话阳上调的情况，其部分单字调调值变异为 21，而连读调保留原籍调值为 33，这与阳去完全一致。也就是说，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的阳上调不论是单字调或连读调都有与其阳去调合并为一的趋势，即如下表所示：

		阳上	阳去
高渊港口 / 瓜拉古楼	单字调	21 (部分字)	21
	连读调	33	33

表 5：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普宁话阳上部分字与阳去单字调与连读调调值比较表

如此一来，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的声调系统就有简化为 7 个声调的趋势，若变异完整，则其上声调的演变就与同安话完全一致，即：只有一个上声调，而阳上都归入阳去。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其本有声调系统中阳上与阳去连读调的同一所带来的内部影响。所以，加上同安话所带来的外部影响，这一变异也算是内外因素相结合的双重影响所致的。

其实，实际调查中我们更多是发现两地的普宁人的阳上调字读音是两可的，即很多字既读 13 也读 21，而且经常摇摆。

总的来说，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在阳上调同时存在普宁话 13 与同安话 21 的两种语音层次，绝对是接触影响下的变异。但相比于瓜拉古楼阴平调的完整变异，这个阳上调的变异仍处于变异过程中。这同时也可看作是普宁话与同安话这两种语音层次的彼此“竞争”。

徐通锵（2008：389）提出在汉语方言历史音变中的一种特殊变异模式，即“叠置式音变”，其云：

“不同系统的同源音类的叠置”则是不同系统的因素共处在一个系统之中，因而相互展开了竞争，如果其中某一个系统的因素在竞争中失败，退出交际的领域，那么在语言系统中就消除了叠置的痕迹，实现了两种系统的结构要素的统一。我们把这种竞争的过程称为叠置式音变。

从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阳上调 13 与 21 两种调值并存的变异现象来看，这就是普宁话与同安话两种“不同系统”在阳上调这一个“同源音类”中的相互“竞争”下的“叠置”所造成的。

（三）阴上的二字连读前字变调，三者都一致与原籍的 13 不同，而变调为 21：

	瓜拉古楼	丹絨檳榔	高渊港口
酒杯	tsiu21 pue33	tsiu21 pue33	tsiu21 pue33
点名	tiam21 m̃ã55	tiam21 m̃ã55	tiam21 m̃ã55
检讨	kiam21 t'ɔ53	kiam21 t'ɔ53	kiam21 t'ɔ53
惨淡	ts'am21 tam21	ts'am21 tam21	ts'am21 tam21
反对	huañ21 tui212	huañ21 tui212	huañ21 tui212
表面	piau21 miñ21	piau21 miñ21	piau21 miñ21
感觉	kam21 kaʔ2	kam21 kaʔ2	kam21 kaʔ2
九十	kau21 tsap5	kau21 tsap5	kau21 tsap5

表 6：阴上前字变调变异举例比较表

瓜拉古楼、丹絨檳榔与高渊港口三个渔村普宁话的阴上前字变调都完全一致变异为 21，而不同于原籍普宁话的 13。这一变异在三个渔村普宁话中都非常彻底，几乎没有例外。结合上述两种声调变异的模式来看，三个渔村之间都有各自特殊的变异形态，可见其变异是有各自相对独立性的。然而这里连读调的变异却如此整齐统一，即三个渔村都同时完全彻底地发生了阴上连读调的变异；尤其再加上按照普宁话与同安话的接触模式来看，这样的声调变异似乎无法找出一个直接而清晰可辨的原因，这就更增加这一变异的特殊性。

根据《同安县志》，福建同安话的上声单字调为 31，其前字连读变调则根据后字调值高低分别为 22 与 24。至于瓜拉古楼同安话，林湘恬（2015）所记的单字调同为 31，而本文追加调查其连读变调^[6]，则与《同安县志》所记不同，即一律变调为 44。所以，按照上述词表的变调形式比较如下：

	《同安县志》	瓜拉古楼同安话
酒杯	tsiu22 pue44	tsiu44 pue44
点名	tiam22 m̃ã24	tiam44 m̃ã24
检讨	kiam24 t'ɔ31	kiam44 t'ɔ31
惨淡	ts'am24 tam31	ts'am44 tam31

反对	huan24 tui112	huan44 tui112
表面	piau24 min22	piau44 min22
感觉	kam22 kaʔ2	kam44 kaʔ2
九十	kau24 tsap5	kau44 tsap5

表 7：福建同安话与瓜拉古楼同安话的上声变调异同表

瓜拉古楼同安话的上声变调模式，是属于厦门方言的变调类型。（参看谭邦君等 1996）这与《同安县志》间的差异，应该是同安县内次方言的类型差异现象，而非马来西亚方言的特殊变异所造成的。^[7]

然而，不论是从福建同安话还是瓜拉古楼同安话的上声连读调来看，都无法解释这三个渔村普宁话阴上连读调调值的变异。因此，若其变异的原因并非源自方言接触的外部影响，则只能通过普宁话自身的音系内部进行探讨。

李新魁（1994）是较早给潮州方言内部的次方言进行分类的，他的三类中“潮普片”包含潮阳、普宁、惠来等。后来潘家毅、郑守治（2010）的分类有些差异，但“潮普小片”仍是将潮阳、普宁同归一类，可见二者内部音系特征是保持着较大一致性的。根据林伦伦（1995）与陈宝贤（2010）二人分别对潮阳方言连读变调的调查，其结果都一致如下：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广东潮阳	33 > 33	55 > 11	53 > 31	313 > 33	31 > 55	11 > 33	11 > 55	55 > 11

表 8：广东潮阳话连读变调表

通过比较，清楚看出潮阳话的连读变调系统与本文三个渔村的普宁话完全一致，尤其这里讨论的阴上连读调，广东潮阳话由单字调 53 变为连读调 31，而本文调查记录这三个渔村的 53 变调为 21，彼此基本相同。

上文提过，这三个渔村的普宁籍居民基本源自普宁市北山村，广东普宁市与潮阳市东西相邻，而北山村属于普宁市流沙镇东街道，位置靠近潮阳市。其实，按照吴芳（2011）调查的潮阳方言，将内部 24 个乡镇的语音差异细分为三种类型。因此我们不排除普宁方言内部原本就存在阴上连读调为 13 和 21 的两种类型。^[8] 若本文所调查三个渔村原籍普宁市北山村的阴上连读调原本就是 21；那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三个渔村与《普宁方言志》所记录阴上连读调的差异理解为本身方言内部次方言的类型差异，就足以说明这三个渔村在彼此相对独立的变异情况下，仍会出现这种没有直接变异条件与原因、而又与《普宁方言志》所记原籍声调相区别的结果了。

四、结语

以上我们对马来半岛北部西海岸三个渔村的普宁话声调变异进行了比较分析，并且结合其社会环境因素，解释其声调变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渔村的普宁话由于与当地其他方言之间不同程度与不同模式的接触影响，发生了声调上的特殊变异，再加上三个渔村之间又由于彼此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不同，最终形成各自不同的变异形态。

我们从这样的个案调查分析中，可以发现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生态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首先，最初的南来先辈们将各自家乡的乡镇话带来，而由于最初方言群相对单一的聚居环境，这些原籍乡镇话都得以较完整地保留；而尤其在远离大城市地区的乡村地方，如本文所调查的三个渔村，这些原籍乡镇话都保留其各自的特征。因此，陈晓锦（2003：5）曾经提出，“马来西亚潮州话并不具体区分潮州音、揭阳音或潮阳音等等”，实际情况也许并不尽然。这一点邱克威（2016）对于雪兰莪州丹絨士拔潮州澄海话的音系分析中已经作过论证；本文对三个渔村的普宁话调查分析，也证明了都基本保留着原籍乡镇普宁话特征，所以马来西亚潮州话各次方言还是相互区分，而并未都同化为统一的一种“潮州话”。

更关键的是，在这些原籍乡镇话的基础上，由于不同方言群之间的彼此接触交流，甚至于聚居一处，从而致使这些原籍乡镇方言发生一些特殊变异。这样的变异，根据不同社群的接

触对象，以及彼此的接触深度，产生出不同的变异形态，而最终形成各自不同类型的“方言变体”。甚至于如本文调查的同为源自普宁北山村的“普宁话”，同时受着周围同安话的影响，然而由于接触深度与接触模式不同，其变异形态也不一样，于是形成不同的“普宁话变体”。比如高渊港口与瓜拉古楼都在同安话影响下，但由于彼此接触深度不同，而形成两种不同的变异类型。这与台北地区闽南语在漳泉混合的情况下形成8种变异类型的情况是类似的（洪惟仁2009）；因此，若扩大范围进行更全面的调查分析，以北马地区普宁话为对象，应可以得出更完整而全面的普宁话“变体类型”的相互比较，乃至不同地域的地域分布。

当然，本文调查分析也显示，这样的接触变异还受到不同社群村镇之间的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马来西亚汉语方言形态的丰富与复杂，正是由于其多元社会的丰富形态所形成的；因此分析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变异及其变异机制，就必然由其地方社会历史与经济文化等层面去进行剖析。

参考文献

- 陈宝贤：《闽南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语言研究》，2010年第30卷第2期。
- 陈竞飞、陈枫：《普宁方言志》，广东：普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
- 陈晓锦：《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 陈晓锦：《论海外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语文研究》，2006年第3期。
- 陈晓锦：《试论词汇研究在海外汉语方言研究中的重要性》，《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9期。
- 洪惟仁：《台北地区闽南语的方言类型与方言分区》，《台湾语文研究》，2009年第3卷。
-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林伦伦：《潮汕方言声调研究》，《语文研究》，1995年第1期。
- 林穆群：《南洋群岛商埠考》，《叻报》，1927年2月10日。
- 林湘恬：《瓜拉古楼闽南方言（同安话）语音研究》，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学士学位论文，2016年。
- 潘家毅、郑守治：《粤东闽南语的分布及方言片的划分》，《台湾语文研究》，2010年第5卷第1期。
- 邱克威：《雪兰莪丹絨士拔村潮州方言（澄海外砂话）音系调查分析》，刊于廖文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吉隆坡：新纪元学院，2016年，195-212页。
- 輶 轩 使 者：《T 值归一法下潮州方言普宁腔流沙口音的调值初探》，[EB/OL]. <http://www.ispeakmin.com/bbs/viewthread.php?tid=2341&extra=&page=1>, 2008-05-19。
- 石峰：《北京话单字音声调的统计分析》，《中国语文》，2006年第1期。
- 谭邦君等：《厦门方言志》，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6年。
- 同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同安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王秀南：《王仙水宗先生传略》，刊于王秀南主编《王氏立姓开族百世谱——暨海内外王氏宗亲会联谊录》，新加坡：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1982年。
- 吴芳：《广东潮阳闽南方言的语音分区》，《台湾语文研究》，2011年第6卷第2期。
-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 许武荣：《潮侨印象记》，新加坡：南洋书局，1951年。
- 杨迎楹：《檳城闽南语上声调调值初探——35 还是 53》，“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会议论文，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主办，2014年。
- 张姿敏：《角头的故事三则》，《学文》，2015年第8期。
- 郑秋盈：《瓜拉古楼的开埠与地方发展》，《学文》，2014年第5期。
- 郑秋盈：《瓜拉古楼潮州方言（普宁话）语音研究》，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学士学位论文，2015年。
- 郑秋盈：《瓜拉古楼潮州方言（普宁话）与原籍普宁话的音系比较》，刊于廖文辉主编《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吉隆坡：新纪元学院，2016年，213-225页。
- RIDA *Report on Rur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1958*, Kuala Lumpur: Rur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1958.

Survey on the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 Tonal Variations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s —— A Case Study on Chaozhou (Puning) Dialect of Three Neighbouring Fishing Villages in North Perak

KHOO Kiak Uei

Abstract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after over a century of interactions with different languages, developed into all kinds of variations. Therefore among the overseas Chinese dialects,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have their own unique research values. Firstly, dialects in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ies maintained much of their original states as the earliest immigrants from Mainland China, 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 where dialect usage still remained very high. However, due to long-term language interactions, especially following the various kinds of societal changes, even the same dialect brought over into Malaysia will result in different unique changes. This paper, by examining the Chaozhou Puning dialect in three fishing villages along the borders of Perak state and Penang state in Peninsula Malaysia, explores the unique tonal variations of their Puning dialects, and the social influences that causes these variations. Hence, we conclude that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s basically maintained their original sound systems brought from their hometown, at the same time experienced some unique variations due to changes in the respective societal factors.

Keywords: Overseas dialects; Malaysian Chinese dialect; Chaozhou dialect; Puning dialect; Dialect tonal variation

-
- [1] 高渊港口的发音调查人有：许耀茂（62岁）、陈成坤（72岁）、张振盛（70岁）。调查时间为4月8-11日以及8月1-8日。
- [2] 丹绒檳榔的发音调查人有：陈财泉（78岁）、许绍卿（80岁）、林辉发（72岁）。调查时间为4月8-11日以及8月1-8日。
- [3] 据瓜拉古楼同安籍居民林亚峇（58岁）口述。林亚峇出生于瓜拉古楼，至今仍居住于古楼港脚，自小开始就随父母捕鱼为业。
- [4] 马来西亚华人对汉语方言的划分方式与一般方言学不同。这里的“福建话”是按照马来西亚华人的理解，即福建闽南漳泉地方的方言。而相应的，属于福建闽南漳泉方言的族群则称为“福建人”。这就如陈晓锦（2006）所说的：“在马来西亚，华人把粤方言称为‘广东话’，把福建厦、漳、泉一带的闽南话称为‘福建话’。”
- [5] 根据采访记录，高渊港口居民许耀茂（62岁）、陈成坤（72岁）、张振盛（70岁）等人都曾谈及这一点。许耀茂与陈成坤都是当地出生的普宁籍居民，他们二人也是本文在高渊港口进行方言声调调查的发音人。他们二人除了本身普宁话，也都会说“福建话”。本文于2016年的4月8-11日以及8月1-8日分别对二人进行方言调查与口头采访。
- [6] 林湘恬的调查对于瓜拉古楼同安话连读变调的处理欠妥善，因此本文在2016年4月22日进行了追加调查，对其论文结论进行了补充修正。
- [7] 如林湘恬调查瓜拉古楼同安话的发音人林亚峇，称其原籍为同安县灌口镇，实则灌口镇在1957年后转归厦门市管辖，而其音系类型也是属于厦门方言的。
- [8] 实际上，《海墘闽语论坛》网站文章《T值归一法下潮州方言普宁腔流沙口音的调值初探》（轱轩使者 2008），其中仿造石峰（2006）利用声波测量计算的T值公式，记录普宁话的连读调为：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32	32	31	32	44	32	54	31

其中记录的阴上连读调调值也是31。然而，由于这篇网络文章并未正式发表，其调查村镇也未具体说明，因此本文对其结论保持审慎态度，仅录于此作为补充论述。